

學術藝師：讀李金銓《傳播縱橫》

黃順星*

書 名：《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

作 者：李金銓

出版日期：2019 年

出 版 社：聯經出版社

投稿日期：2020 年 8 月 17 日；通過日期：2020 年 9 月 27 日。

* 黃順星為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舍我研究中心副研究員，email: frankhuangtw@gmail.com。

本文引用格式：

黃順星（2020）。〈學術藝師：讀李金銓《傳播縱橫》〉，《新聞學研究》，上網日期：__年__月__日，取自 https://mcr.nccu.edu.tw/web/backissues/latest_paper_in.jsp?pp_no=PP1602058476760

聽聞李金銓教授整理近作，付梓出版一事已久，但因作者求好心切、再三琢磨內容而推遲出版時程，加上臺灣出版業長期視學術出版為畏途及中國捉摸不定的審批制度，使大作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2019年9月終於由臺北聯經出版社推出繁體版，簡體版稍後於11月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書名雖同，但兩地內容略有出入：聯經版計有十九章，六篇附錄；社科版則為十章，四篇附錄。主要差別在聯經版中原第三篇〈訪談錄：治學經驗拾綴〉收錄的八篇訪談，在社科版中僅存〈海外中國傳媒研究的知識地圖〉與〈傳播研究的方法論〉。聯經版中的附錄二〈入乎其內，出乎其外——走進「流動的家園」〉、附錄四〈論《大公報》和張季鸞的文人論政〉、附錄五〈他是一個點亮明燈的人——追念徐佳士老師〉、附錄六〈門風 會風 春風〉及〈記者與時代相遇——以蕭乾、陸鏗、劉賓雁為個案〉，則未為社科版收錄。

開篇為全書序言，隨後依序為三大主題：國際傳播、民國報刊與訪談錄。作為序言的〈傳播研究的時空座標〉一文，除了替本書導覽引介之外，也可視為作者從方法論與認識論出發，思索傳播研究如何在殊異的文化歷史脈絡下，獲取求同存異、互為主觀知識的可能。第一篇以國際傳播為主四篇論文，主題環繞在「傳播研究的『內眷化』、窄化與碎片化」（頁56）。如作者在本書第二章〈傳播研究的「內眷化」〉所言，內眷化（involution）源自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研究爪哇經濟何以無法出現根本變革時所提，但隨後如黃宗智用於分析中國社會經濟，Prasenjit Duara 藉此分析中國政權的擴張等等，早已脫離農業研究的脈絡，成為社會理論的重要譬喻。

作者將慣常譯為「內捲化」的概念，更動一字以「眷」替代：

偏重強調學界眼光向內看的過程，而內眷化保存了眷顧的意思。以此引伸，描述學者抱住一個小題目，在技術上愈求精

細，眼光愈向內看，問題便分得愈窄愈細……。其結果是不但忘記更大的關懷，更阻礙思想的創新（頁 99）。

因此，在第三篇所輯錄的多篇訪談錄裡，即不斷強調傳播學人不應畫地自限，不但須揚棄文化本質主義，更不應受學科之限，以吸納不同養分壯大傳播研究。

除了透過「內眷化」概念貫穿第一篇各文外，讀者不妨以「典範轉移」（範式轉移）為關鍵字閱讀這四篇論文。無論在第二章中梳理芝加哥學派到哥倫比亞學派的嬗遞、第三章論述國際傳播研究領域中現代化理論與依賴理論的對抗，乃至第四章探討發展傳播的興起與困境，書寫的內容不限理論發展的內在理路與爭論，更將相關理論發展的社會歷史情境做簡明清晰的鋪陳。甚而不斷以自身研究為例，示範如何在實證經驗與理論建構中來回穿梭，反思知識的可能。有興趣的讀者可進一步將第一篇的內容，與 Charles Wright Mills（1959／張君玖、劉衿佑譯，1996）在《社會學的理想》中所批判的鉅型理論（grand theory）與抽象經驗主義（abstract empiricism）閱讀比較，可更清楚掌握當時美國的社會學與傳播學動態。

第二篇的主題是李金銓教授近年投入甚深的民國新聞史研究。〈近代中國的文人論政〉與〈報人情懷與國家想像〉，各為先前兩本由作者召集會議並主編出版的民國新聞史論文集序論，不但概述文集內容，也提綱契領地勾勒出民國新聞史的可能研究方向。〈半殖民主義與新聞勢力範圍〉與〈密蘇里新聞教育模式在現代中國的移植〉，由李金銓教授與得意門生、現任教於密蘇里大學的張詠（Yong Volz）所合著，分析英美如何在中國擴展新聞版圖，以及混雜進步主義與實用主義的密蘇里新聞教育模式，如何引進乃至主宰中國新聞教育的過程。就筆者涉獵的研究文獻而言，民國新聞史研究多以報紙內容作為文本分析對象，頂多

關注跨國訊息如何流通與再現，從新聞教育模式的國際化著手之研究，殊為罕見。

誠如作者所言，「Mills 的《社會學的想像》影響其學術興趣與風格甚鉅」（頁 100），Mills（1959／張君玫、劉衿佑譯，1996）在《社會學的想像》中的〈論學術藝師精神〉（“On Intellectual Craftmanship”），以其一系列的階級研究，向讀者演練展示研究技藝。類似地〈記者與時代相遇——以蕭乾、陸鏗、劉賓雁為個案〉一文，可視為親身示範如何將社會學想像運用於新聞史研究的力作。這篇文章也反映李教授的偏好，即藉由具代表性的個案建構理念型（ideal type）以進行歷史社會分析：

韋伯式的方法出入於實證論和現象學之間，從社會演員的意義世界入手，然後由研究者居間引進理論和概念，以便在歷史中照明一層層社會演員的意義結構，幫助他們闡釋生活的世界，這個方法可以兩頭兼顧實證的因果和現象學的意義」（頁 175-176）。

作者對歷史問題的關注，除來自社會學的想像啟發外，在由訪談所構成的第三篇中所收錄的〈我這代臺灣學人對於歷史多少是有興趣的〉一文，提及投入新聞史研究的契機：「對歷史多多少少是有興趣的，然而，這一代人也很有慚愧，我大學時代讀的新聞史教材現在還在用，臺灣如此，大陸也一樣」（頁 566）。但「新聞史學界一向因循保守慣了，不講究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理論，很少有方法論的自覺」（頁 36）。文中所批評的是多數民國新聞史的書寫方式僅為材料堆砌，雖然不乏見解論點，卻缺乏詳盡的論述推理過程。在這種評為流水帳式、不及格的敘述歷史（narrative history）之外，另一種研究民國新聞史的途徑，以德國海德堡大學 Rudolf Wagner（華格納）等人對《申報》、《點石齋畫

報》的研究為代表。

華格納（2007）認為，藉由分析位於華洋交界、治外法權之地的上海報刊，可以思考跨國族、跨空間與跨階層的異質化公眾的可能。與 Jürgen Habermas（哈伯瑪斯）分析經由與國家激烈鬥爭，爾後逐漸分立的西歐資產階級公共領域不同，華格納等人認為在清末民初的上海報刊中可以發現一個揉雜公私官民、高雅低俗、華洋交錯的「公共領域」正逐漸浮現。但李金銓教授認為華格納等人的研究，明顯為理論先行，削足適履之作，而且對公共領域的界定失之寬泛，難免淪於各說各話的窘境。在〈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一文中，即透過對華東師範大學唐小兵教授（2012）同名專書的閱讀，指出作者藉由具體紮實的史料分析，將文本還原到當時的社會與人際網絡的互動與分化，呈現實存於民國史中的文人，與顛簸不已、早熟難產的民國公共領域。

綜觀本書，李金銓教授藉由累積四十年的學術經歷，回頭省思國際傳播的侷限與可能，開拓展望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未來。這樣的關懷與視角，始終不離 Mills 所強調必須將個人困擾與公共議題連結分析的呼籲。就此而言，本書中突出局內人與局外人觀點的互相滲透，就不只是基於 M. Weber（韋伯）詮釋社會學在方法上的必然，也反映作者本人四十年來，穿梭於太平洋兩岸而在身分與視角上的頻繁變換。這種看似無附著、熟悉又陌生的親身體驗，並未讓作者產生類似 Said（2000）「格格不入」（out of place）的局外人疏離感，反而以局內人獨具洞悉內情的特質，發展出具有普遍意義又不犧牲文化獨特性的理論視野。這種立基於現象學傳統，重視互為主體、脈絡主義的理論特色，已被不少評論者所注意。

例如孫信茹（2020年1月1日，2020年2月7日）即認為「全書的脈絡既是一種連接、轉換、融通的視角，更是一種方法論和知識論的

言說」；朱麗麗（2020年3月23日）也認為「每一個特殊的文化場域，都有其特殊的本土經驗，因此李金銓一再強調回歸歷史脈絡中去發現問題、理解問題」；吳飛與李佳敏（2020年4月30日）則將李金銓教授的脈絡主義與歷史意識掛勾，突出國際傳播理論發展中蘊含深刻的歷史意識。論者所忽略的是，李金銓教授是在保有對文化中國論述的警醒，以及反對文化本質主義的立場下而有此論述。尤其是在回應「華人的傳播學術視野在哪裡」的問題時作者提醒：「從來沒有一個籠統的『華人視野』，將來也不會有」，而且：

休叫霸權的文化遮蓋地平線。學術的原創力未必和地理面積的大小成正比，中國大陸內部的發展失衡，漢民族和少數民族、沿海和內陸的矛盾顯豁，廣州看到的中國和青海看到的中國是兩樣的。北京向「一國」的傾斜，正如香港對「兩制」的維護，這在媒介論述中看得很清楚。（頁174）

這段原出自2004年《超越西方霸權》中〈視點與溝通〉的段落，如今讀來不免感嘆世局發展被不幸言中。對學術研究而言，過度地突出文化特殊性、差異性，免不了成就另一個壓抑弱勢少數、自我封閉的霸權。如何在持續的對話與交流下而能「入乎霸權，出乎霸權」，是學術工作者必須持續戮力思考之處。

雖然Schudson（2008）不無反諷意味地指稱「社會學的想像」，已成美國新聞界的陳腔濫調乃至政治正確，但Schudson仍肯定Mills所呼籲將個人困擾與公共議題結合思考的必要性。2004年在翁秀琪教授號召下，臺灣傳播學界集結出版《台灣傳播學的想像》（翁秀琪編，2004）。該書不但描繪臺灣傳播研究的歷程與現況，也反思學科領域的發展。十餘年過去，傳播媒介已翻天覆地好幾番，如今的傳播學界該如何定位自身？傳播研究又如何有益於公共議題？報禁解除後，李金銓教

授即援引侍從主義，解釋長期被扭曲的臺灣報業體制，此後侍從報業成為理解臺灣傳播結構的重要，甚至唯一的參照。新的傳播環境已儼然成型，傳播學人是否發展出貼近當前結構情勢的研究論述？又如何有助於理解在地情境、化解本土困境？除了在理論知識上的精進外，如何避免學術研究淪為「毫無用處的精緻研究」（頁 100），仍是學術工作者必須時刻檢視的議題。

書中對民國新聞史研究的評論，臺灣讀者也許感到陌生，因為主要的批評對象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社群，況且「新聞史」早從許多臺灣新聞傳播科系的必修科目中刪除，教科書翻新與否，新聞人物如何被記憶似乎無關宏旨。民主化後的臺灣新聞言論已無禁忌，更不需要以古諷今；數位科技與社群網路的普及，衝擊傳統報紙新聞為主流的新聞生產模式，生死存亡之際的新聞業，面對的是新媒介技術的挑戰，這些現象聞所未聞，探尋歷史又有何益？Marshall McLuhan（麥克魯漢，1964, p. 8）曾言：「任何媒介的內容，總是另一個媒介」，舊媒介從未死去，只是以另一種形式出現。人總是從後照鏡探知現在與未來，後照鏡難免遲滯保守又總是後見之明，但若無此回望，恐難評估如何前行。

參考書目

- 朱麗麗（2020年3月23日）。〈讀李金銓《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文匯報》。取自 http://wenhui.whb.cn/zhuzhanapp/xueren/20200323/334859.html?timestamp=1584936838673&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fbclid=IwAR1ACTJfrIXKo0WcWwPcN3w5VtT1f142nhVQOnj52ifddKbLq_prp8R1tc
- 吳飛、李佳敏（2020年4月30日）。〈歷史意識與比較視野：讀李金銓的《傳播縱橫〉〉，《重建巴別塔》【微信公眾號】。取自 https://mp.weixin.qq.com/s/0Gh7HBEbcUFgGbAJ_y42xg?fbclid=IwAR3MIM_ysw2b43gkig0R_I8oLd5WafqOFGIP5Wi76_4SeGVbdtS_ICt5Zcw

- 唐小兵 (2012)。《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翁秀琪編 (2004)。《台灣傳播學的想像》。臺北：巨流。
- 孫信茹 (2020 年 1 月 1 日)。〈在學術對話中報了到：學者的視野、脈絡與對話〉，《風傳媒》。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2123634?page=1>
- 孫信茹 (2020 年 2 月 7 日)。〈全球視野下的“在地性”與“文化性”〉，《風傳媒》。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2261771>
- 張君玫、劉衿佑譯 (1996)。《社會學的想像》。臺北：巨流出版社。(原書 Mills, C. W.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London, UK: Routledge.
- Said, E. (2000). *Out of place*.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Schudson, M. (2008).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as Cliché: Perils of sociology and practices of journ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20(1), 41-49.
- Wagner, R. (Ed.). (2007).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 image, and city in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New York,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